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回鹘语题记

松井太撰，白玉冬译

提要：莫高窟和榆林窟的回鹘文题记可以成为10—14世纪回鹘史的重要（史料）来源：有些题记可用来确认回鹘统治者的形象，这些统治者与敦煌王国的统治者（之间）有着外交关系，而其他题记则是由虔诚的信徒而写，为了纪念他们的信教活动。在伯希和去世之后出版的多卷本《伯希和考古记》向学术界公开了他抄写的这些回鹘文题记的手抄本，但要以这些手抄本来还原其原始文本并不容易。迄今为止，学者们零散地、以个人的形式介绍了他们自己的解读，这些解读中的绝大部分建立在图片再现的基础上。近几年来，我有一些机会去参观莫高窟和榆林窟，调查那些题记，我想展示其中的一部分，以对敦煌地区回鹘史作出新的解释。

敦煌地区诸石窟（即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西千佛洞等）的壁画中，存在部分以汉语、藏语、西夏语、回鹘语、蒙古语等语言写成的题记。这些题记，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榜题，特定用于描绘与石窟营造、重修有关的当地的政治上层人物或权力统治者的供养人像。第二类为漫题，是来自欧亚各地的拜访敦煌石窟的佛教巡礼者，为纪念自身巡礼所留。这两种题记，均反映出历史上支持过敦煌石窟及敦煌佛教的政治权力构造，以及佛教徒的信仰实态，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这些题记之中，有关汉语题记，以谢稚柳《敦煌艺术序录》（上海，1955年）、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为首，已经有相当程度的研究基础。但关于纪年属于10至14世纪的回鹘语题记，就质与量双方面而言，还未得到充分研究①。

---

① 1907—1908年，伯希和（Paul Pelliot）在调查莫高窟时，对汉语以外的诸语言题记进行了摹写。这些记录，在伯希和去世后，作为《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Grottes de Touen-houang*）》六卷（巴黎，1981—1992年）出版。但1907—1908年之际，伯希和尚未通晓回鹘文字，其回鹘字的摹写存在很多不正确之处。故萨仁高娃2006论文中，依据伯希和的摹写而提出的题记解读案，需要注意。除此之外，关于莫高窟、榆林窟个别回鹘语题记的研究，有Kara 1976。关于蒙古语题记，则有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师范大学蒙文系1990的出色研究。

1998 年，哈密顿（James Hamilton）、牛汝极两位教授，在法国《亚洲学杂志（*Journal Asiatique*）》发表《榆林佛教石窟回鹘语铭文》一文，对总计达 20 条的榆林窟回鹘语题记进行了介绍，使得研究状况得到了很大进展①。本文的著者，依据哈密顿与牛汝极两位教授的研究，在 2006 年对榆林窟回鹘语题记进行了调查，并在 Matsui 2008 论文中发表了一部分成果。进而，笔者利用 2010 年至 2012 年的三年时间，对为数更多的莫高窟、榆林窟石窟进行了调查，搜集到了更多的资料。在此，就其中部分成果，进行介绍。

一、榆林窟第 39 窟回鹘贵族人像榜题

榆林窟第 39 窟，属于所谓的“沙州回鹘时期”。前室甬道南壁绘有总计 23 身回鹘男性供养人像，北壁绘有总计 27 身回鹘女性供养人像②。

北壁供养人群像分为上下二段，上段顶端（左端，即西端）为比丘尼像。紧接该比丘尼像的东侧女性供养人像，可认为是世俗人物中占据最高地位的重要人物。在紧邻该女性供养人像的西侧赤褐色的榜牌内，写有半楷书体回鹘文榜题 1 行。该榜题，森安孝夫先生释读如下：

tngrikän oγša-γu qatun tngrim körki bu ärür qutluγ q[ïv]lïγ bo(l)maqï bolzun

“此乃神圣的斡忽沙忽可敦（Oγša-γu qatun）殿下之肖像。愿她能得到上天之宠而幸福！”③

上文中的斡忽沙忽可敦，附有尊称“神圣（tngrikän）”、“殿下（tngrim）”。据此可认为，该人物是回鹘王室之一员④。并且，可推定，她嫁给了绘于对面甬道南壁顶端的回鹘男性供养人，或为该回鹘男性供养人的女儿，因嫁给了回鹘王室而成为了可敦。

该回鹘男性供养人，头戴无檐三叉冠。头戴同样无檐三叉冠的回鹘供养人形象，在吐鲁番的发现中存在很多。据对这些供养人像的美术史方面研究，回鹘可汗与回鹘王

① Hamilton / Niu 1998. 同年，哈密顿、牛汝极、杨富学三位教授联名发表了中文论文（哈密顿、杨富学、牛汝极 1998）。进而，牛教授就榆林窟第 12 窟题记，发表了论文（牛汝极 2002）。但发表于上述中文论文中的回鹘文校订，基本上沿袭了 Hamilton / Niu 1998 校订。相关介绍，见 Matsui 2008，p. 18.

② 彩色图版刊出于《中国敦煌壁画全集 10 · 敦煌西夏元》，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第 11－13 页。

③ 森安孝夫 2011c，p. 521.

④ Moriyasu 2001，第 164 页；另关于 tngrim 作为对王族之尊称“殿下”的用法，参见森安孝夫 2011a，第 30 页。



图1　榆林窟第39窟甬道南壁回鹘男性供养贵族像

族头戴莲瓣形镂花高冠，但不属于回鹘王族的贵族、官员头戴无檐三叉冠。因此可认为我们在此讨论的回鹘男性供养人，其地位低于回鹘王族，属于贵族[①]。

紧邻该回鹘男性供养人的西侧，是题写榜题用的绿色榜牌。有关该榜题，以往的报告只介绍为写有已经褪色不能判读的回鹘语题记【图1①】。但经过现场调查，笔者成功解读了这一行题记。该题记，字体为半楷书体，确与斡忽沙忽可敦的榜题属于同一时代，内容如下。

il'ögäsi sangun ögä bilgä bäg qutï-nïng körmiš ätöz-i bu ärür qutluγ qïvlïγ bolmaqï bolzun yamu

"此乃颉于迦斯（宰相）·相温·于越·毕里哥·伯克阁下之真影。愿他能得到上天之宠而幸福！"

【词注】

起始处的"颉于迦斯（il'ögäsi ~ il ögäsi）"，为自漠北回鹘汗国至西州回鹘时期通用的回鹘语称号。其原意为"国（il）之顾问（ögä）"，但实际上是漠北回鹘汗国、西州回鹘的最高职官"宰相，摄政"[②]。在该处，不同于一般的写法（'YL 'WYK'SY = il ögäsi），而是两个单词连成一体，写作 'YL'WK'SY = il'ögäsi。

紧随其后的四个单词"相温·于越·毕里哥·伯克（sangun ögä bilgä bäg）"，指的是绘于此处的男性供养人其人。回鹘语 sangun 为汉语"将军"的借用语，但五代至宋代时似乎已被遗忘，汉文资料音译为相温、萨温、索温、娑温、撒温等。回鹘语 ögä 是意为"顾问、大臣"之称号，汉文资料音译为"于越"。将上述二者连缀的 sangun ögä 视作意为"将军（兼）宰相，军机大臣"的官称号，未尝不可[③]。而回鹘语 bilgä 意为"贤明的"，

① Battacharya-Haesner 2003, pp. 352 - 355, MIK III 4524; Russell-Smith 2005, pp. 24 - 25; 谢静、谢生保 2007，第83页；竺小恩 2012，第39 - 40页。

② Moriyasu 2001, pp. 175 - 177.

③ 另高昌出土回鹘文"第三木杵文书（Stake Inscription III）"中，见到 Alp Sangun Ögä Alpyaruq 这一人物。参见 Moriyasu 2001, pp. 175 - 177。该人物名亦可解释做"勇猛的（alp）军机大臣（sangun ögä）亚鲁不·牙鲁克（Alp-Yaruq "勇猛的光辉"）"。

bäg 意为“长官,头领,领导”。该毕里哥·伯克(bilgä-bäg, 意为“贤明的首领”)不属官号,确为个人名号。接下来的回鹘语 qutï,经常作为相当于“陛下、殿下、阁下、猊下”之意的尊称而被广泛使用①。

上面提到的男性回鹘供养人的称呼中,不包含如其对面的斡忽沙忽可敦那样的“神圣(tngrikän)”、“殿下(tngrim)”等称呼。据此可推断,该男性供养人,并非回鹘王族之一员,而是身居高位的贵族。这可进一步补充前面所介绍的美术史方面根据其装束、头冠等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

回鹘语 körmiš 意为“见了”,ätöz('TWYZ,通常写作 'T'WYZ = ät'öz)意为“身体、肉体”。因此,körmiš ätöz 可解释做“如同见到的(本人)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姿态、真影”。

除榆林窟第 39 窟之外,敦煌诸石窟中还存在其他属于“沙州回鹘时期”的石窟。有关“沙州回鹘”,当今学界有两种学说对立。其一说认为“沙州回鹘”是以东部天山地区为统治核心的西州回鹘掌控下的一派回鹘,另一说认为他们是从西州回鹘分离出来的一派,与从东方移居过来的甘州回鹘合流,在沙州地区创建独立王国。主张第一种学说的森安孝夫,列举众多论据,批判了第二种学说,所言甚是②。进言之,上面提到的有关西州回鹘与沙州回鹘供养人像的美术史方面的研究,亦反映两者的装束服饰文化完全共通③,力证森安孝夫之说。因此,可认为,榆林窟第 39 窟的回鹘供养人像,亦属于西州回鹘的统治阶层。

然而,迄今为止,从东部天山地区至吐鲁番地区出土的西州回鹘时期的回鹘语文献之中,尚未发现相当于上述“颉于迦斯·相温·于越·毕里哥·伯克(il ögäsi sangun ögä bilgä bäg)”,与“斡忽沙忽可敦(Oγšaγu qatun)”的贵族人物。但需要关注的是,西州回鹘的统治阶层中,存在带有“沙州将军(šaču sangun)”这一称号的强势人物。可认为,该“沙州将军”担负西州回鹘的沙州、敦煌地区之统治任务④。若榆林窟第 39 窟的“相温·于越·毕里哥·伯克(sangun ögä bilgä bäg)”名号中的“相温(将军)·于越(sangun-ögä)”,与吐鲁番地区回鹘语文献中的“沙州将军(šaču sangun)”有关的话,则榆林窟第 39 窟的“相温·于越·毕里哥·伯克(sangun ögä bilgä bäg)”可能是由西州回

① 森安孝夫 2011a, pp. 29 - 31。
② 森安孝夫 2000; Moriyasu 2000; 森安孝夫 2011c, p. 529。
③ 谢静、谢生保 2007。
④ 森安孝夫 1980, p. 334。

鹘以“沙州将军”之名派至沙州的重臣,负责敦煌地区统治①。

二、莫高窟第 332 窟蒙元时期供养贵族夫妻榜题

莫高窟第 332 窟,创建于初唐,五代、蒙元时代、清代亦曾重修。在通往主室的甬道两侧(南壁与北壁),绘有蒙元时代的供养人像。南壁绘有男性供养人与二位侍者,北壁绘有头戴蒙古族女性贵族特有的顾姑冠(蒙古语 boγtaγ)的三位女性供养人及其子女一位。该供养人像因体现蒙元时代统治阶层的佛教信仰而著名,其彩色图版亦被公开发行②。

这些供养人像,被绘于用绿色框线区分开的空间内。在上述绿色框线上,用草书体回鹘文记有榜题。

① 甬道南壁,打头的男性供养人像前方(西侧)竖框线【图 2①】



图 2　莫高窟第 332 窟甬道南壁蒙元时期男性供养贵族像

[　　]D(.)y [　　] ön(š)i-ning körki ol

① 《宋会要輯稿》蕃夷五・瓜沙二州记录的皇祐二年(1050)四月,沙州派往北宋的使节名“符骨笃末似婆温”中,末尾的“婆温”为“娑温”之訛,相当于回鹘语“相温;将军(sangun)”。参见森安孝夫 2000, p. 26。

② 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 5 卷,东京: 平凡社/北京: 文物出版社, 图 161, 162; 段文杰(编)《中国敦煌壁画全集 10・敦煌西夏元》,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 图 175, 176。

“……是……院使(önši)之像。”

② 甬道南壁,最末尾的男性供养人像后方(东侧)竖框线【图2②】

män s(o)sï tu küsüš ödigläp yu̯kündüm

“我,苏失都统(Sosï tu)记下愿望并进行了参拜。”

③ 甬道北壁,女性供养人像前方(西侧)竖框线【图3③】



图3 莫高窟第332窟甬道北壁蒙元时期女性供养贵族像

[ ](-ning?) körki qïzïm la[čï]n? tigin-ning'ol

“……像是我女儿剌真的斤(Lačin-Tigin)之像。”

【词注】

① 汉语“院使”的借词 önši,亦见于黑水城出土蒙元时期的回鹘语书信 F9:W105[①]。② 该题记的作者“苏失都统(Sosï tu)”的称号 tu,是汉语僧官号“都统”借词 tutung 之略记。③ “剌真(Lačin)”是人名,意为“鹰”。原本专指男性王族成员的“的斤(Tigin)”称号用于女性贵族成员,亦有其他事例[②]。

上述回鹘语题记①②③,与绘于本窟的蒙元时代供养人像有关,此点无疑。而供养

① 梅村坦、松井太 2008, p. 192。

② Zieme 1978, pp. 81, 82; Moriyasu 2001, p. 166.

人像装束，为典型的蒙古贵族阶层、统治阶层之装束。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即供养人是蒙古族出身，抑或回鹘族出身。若供养人出身蒙古族，但描绘他们的供养人像榜题，不是用蒙古语，而是用回鹘语记录，这说明当蒙古族接受佛教文化之际，回鹘族佛教徒给予了他们重大影响。反言之，若供养人属于回鹘族，但他们身着典型的蒙古族装束，这说明操回鹘语的回鹘族佛教徒的一部分，当时已同化于河西地区的蒙古统治阶层。总之，从中可窥见到蒙元时代敦煌地区的蒙古族、回鹘族通过佛教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①]。

另根据题记①②③的笔迹，可推定这些题记均为②的作者“苏失都统”所书。但该人物是否就是③女性贵族“剌真的斤”之父，尚不能速断。

三、榆林窟第 12 窟游人题记 H 重考

该题记为榆林窟第 12 窟众多回鹘语游人题记之一，写于前室甬道南壁。哈密顿、牛汝极二位教授，以 Inscription H 之名对此进行了介绍。笔者曾对上述两位的释读进行若干补正，阐明该题记为蒙元时期以哈密为大本营的威武西宁王家族之普颜忽里（Buyan-Quli）的家臣所写[②]。

之后，笔者利用性能优良的设备进行再次调查，发现笔者的校订稿存在需要修正之处，故在此对最新判读结果进行介绍。

1　　quḍluγ [luu] yïl (.....)
2　　YYL(…) (…)
3　qaγan-qa (s)oy[u]rqadïp qamïl-qa in[čü? birilgä]n?
4　　[b]uyan qulï ong bašlaγ-lïγ biz X'D(....) P(....)
5　　[　]ḍämür qïsaq-čï napčik-lig qamču taγa[y?　]
6　　[　](.) ṭaruγačï-nïng oγ[u]lï tärbiš bašlap
7　　[　]KWY-lar birlä kä[li]p
8　　[　] ong-nïng s(u)burγan süm-ä-tä kälip
9　　[yan]mïš-ta bu süm-ä-tä män yavlaq baxšï [　]
10　　[bï]žï (b)itig-či tämür kin körgü

① 关于此问题，松井太 2008，p. 37 已经指明。
② Hamilton / Niu 1998，Inscription H；Matsui 2008，Inscription H.

11 [ödig] bolzun tip bitip bardïmïz

12 sadu sadu bolzun

“幸福的[龙]年[某月某日]……以蒙皇帝恩赐、于哈密[受封领地(inčü)的]、普颜忽里王(Buyan-Qulï ong)为首领的我们 X'D(....)、P(....)、……帖木儿([...]-ḍämür)驾车者、纳职(Napčik)的甘出·塔海(Qamču-Taγay)、……达鲁花赤之子帖儿威失(Tärbiš)以及[…],与[…]KWY 们一起来,来到[……]王的塔寺(s(u)buryan süm-ä),[回去]时,在该寺,我拙劣的僧师 […]-[bï]žï 与书记帖木儿,我们为以后留作纪念写完出发了。善哉,善哉。”

【词注】

行2:旧稿此行遗漏。

行3, qaγan-qa (s)oy[u]rqadïp qamïl-qa in[čü? birilgä]n?:“蒙皇帝恩赐(qaγan-qa soyurqadïp)”这种表达方式,亦见于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回鹘文面(第三截第45, 49行)①。众所周知,qamïl 为现在的哈密。该行末尾部分,旧稿只换写作 Y[ ]N。破损部分之前的文字确切读为 'YN[…]。因第4行普颜忽里王(Buyan-Qulï ong)可比定为以哈密为大本营的威武西宁王普颜忽里,故该处破损部分推定复原做 in[čü birilgä]n“受领封地的”。突厥语 inčü ~ enčü“封臣,领民;封土,领地”在10至11世纪前后的回鹘文书,以及于阗文钢和泰藏卷(Staël-Holstein scroll)中均能得到验证。蒙古语 in□jü ~ ömčü 与波斯语 īnčū,均为借用突厥语 inčü②。

行4, [b]uyan qulï ong:旧稿只读出人名 Buyan 的末尾的 -N,但经过这次调查,确定读作[P]WY'N = [b]uyan。该普颜忽里王(Buyan-Qulï ong)与在哈密受领封地的威武西宁王普颜忽里(Buyan-Quli)为同一人物,属于察合台后裔术伯(出伯,Čübei)一族③。

行8, s(u)buryan süm-ä:旧稿记作(.)YPWR(....),但这次考察,确定读作 S(.)PWRX'N = s(u)buryan。突厥语 suburγan 意为“墓”,但借用该单词的蒙古语中,suburγan 意为“塔;塔形墓”④。但并无史料记录蒙元时期榆林窟之地为墓葬之所,故该

① Geng / Hamilton 1981, p.20; 刘迎胜、卡哈尔 = 巴拉提 1984, p.67。

② 村上正二 1951; TMEN I, Nr. 670; MOTH, p.91; 森安孝夫 1991, p.196。

③ Matsui 2008, pp.19 - 20.

④ ED, p.792; Lessing, p.733; 《蒙汉词典》p. 949.

处的 s(u)buryan süm-ä 应解释做“塔寺”(回鹘语 süm-ä 是蒙古语 süm-e ~ süme“寺,庙”的借用语)。

行 9, bu süm-ä-ta: 此处更正旧稿的 buyanïmïz-(nï) ta。

行 10, [bï]žï: 能见到词末的-Z-Y,据此补正。该佛教称号 bïžï 有来自汉语“毗尼”的可能性,但音韵学方面不敢确定①。

行 10, (b)itig-či: ~ bitkäči“书记”。旧稿只推测为 (P)Y(....)K-čï,但这次考察后确定可改读。

行 11, bitip: 更正旧稿的 sümtä“于寺”。

行 11b: 旧稿在 bardïmïz“去了”之后,读作 män(?) bi[t]i(p?)“我写”。但该字属于其他人书写的另一题记。

行 12, sadu sadu bolzun: “善哉,善哉”。更正旧稿的 quḍ[luγ] bolzun。另该字之后的 bardïmiz “我们去了”,属于其他人书写的题记。

如上所述,该回鹘语题记是以哈密为大本营的威武西宁王普颜忽里的臣僚(X'D)(....)、P(....)、[…]-帖木儿、甘出·塔海、帖儿威失等人与佛僧某 bïžï、书记(bitigči)帖木儿,巡礼榆林窟之际的纪念题记。上面介绍的更正,均为题记细微之处,不会大幅改变旧稿中提到的对题记整体内容的理解②。

四、莫高窟第 61 窟的回鹘文游人题记

莫高窟第 61 窟,即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功德窟,建成于 950 年前后。元代在此窟窟前修建木构佛堂,命名“皇庆寺”。其甬道南壁,描绘有西夏时期的供养比丘尼像。

① Matsui 2012, p. 120.

② 最近,杨富学、张海娟二位利用笔者在旧稿中刊出的该题记校订,主张以下三点。(一) 该题记中的“普颜忽里王”与元代汉文史料中的“邠王嵬厘/豳王嵬力”实指同一人,(二) 当时威武西宁王应居于纳职(Napčik;现在的拉布楚喀 Lapčuq)一带,(三) 威武西宁王普颜忽里家族本为蒙古人,但在赴榆林窟朝山拜佛时,却用回鹘语文而非蒙古语文书写题记,体现了元代蒙古贵族的回鹘化。参见杨富学 2011, pp. 102 - 103; 张海娟、杨富学 2011, pp. 88 - 89; 杨富学、张海娟 2012。但笔者对上述主张,均不敢苟同。其中,第一点,将《元史》顺帝本纪所记至正十二年(1352)秋七月对邠王嵬厘之恩赏一事,与该题记的“蒙皇帝恩赐(qaγan-qa (s)oy[u]rqadïp)”一节联系起来,属牵强付会。并无直接证据,能够证明以肃州为据点的豳王(邠王),与以哈密为据点的威武西宁王为同一人物。第二点,只是将巡礼者中的一员甘出·塔海(Qamču-Taγay)的出生地纳职(Napčik),做了夸大解释。第三点,只是单纯臆测,因依据题记内容,无法明断威武西宁王普颜忽里本人是否参加了该巡礼。而且,需要注意的是,诚如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师范大学蒙文系 1990 论文所介绍,莫高窟、榆林窟遗留有众多蒙元时期的巡礼者以蒙古语写成的题记。关于蒙元时期河西地区的蒙古族与回鹘族之间佛教文化交流,结合本稿介绍的莫高窟第 332 窟蒙古装束供养人像等,有必要综合多个事例进行细致探讨。

该供养比丘尼像，因左肩旁（西侧）有汉文与西夏文合璧榜题“扫洒尼姑播盃氏愿月明像”而著名，其彩色图版也已公开发行[①]。

该比丘尼像两边腋下，标有回鹘语与回鹘体蒙古语题记。西侧的回鹘体蒙古语题记共5行，业已由哈斯额尔敦、嘎日迪、巴音巴特尔三位圆满解读[②]。但对于东侧共计4行的回鹘语题记【图4（A）】，只有森安孝夫先生曾作过部分介绍，尚未完全解读[③]。另实地调查发现，在上述4行回鹘语题记的左侧（东侧），另有大概由同一人物所写的2行回鹘语题记。到目前为止，在已公开发行的图版目录中，尚不能确认到后者。下面，笔者列出上述4行题记（A）与2行题记（B）的解读案。



图4　莫高窟第61窟甬道南壁供养比丘尼像

A　1　yïlan yïlïn tangut čölgä-täki manglay

2　taykim baγatur bu mančuširi bodistv-qa yụküngäli

3　kälip yụkünüp barïr-ta kin-ki körgü bolzun tip qop

4　kiši-tä qour kọngül-lüg qočo-luγ mungsuz šabi qy-a bitiyü tägintim

“蛇年，西夏路先锋台金·拔都儿（Taykim-Baγatur），来拜此文殊菩萨，拜完回去时，为作日后纪念，所有人中最毒心肠的我，高昌的孟速思·沙弥谨书。”

B　1　yïlan yïl tangut čölgä-täki

2　manglay-taqï tümän（bä）gi tayk（im）

“蛇年，西夏路先锋万户长台金（Tayk（im））”（后缺）

【词注】

A1，B1，tangut čölgä：tangut相当于汉文史料所见“唐古；党项”，指西夏及其统治

① 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5卷，东京：平凡社/北京：文物出版社，图160。

② 哈斯额尔敦、嘎日迪、巴音巴特尔1989。

③ 森安孝夫1988，pp.441－442。

下的河西地区。čölgä 为蒙古语 čölge 的借用语，相当于蒙元时期行政区划的“路”。即，“西夏路(Tangut čölgä)”指的是在原西夏国首都中兴府(兴庆)设置的西夏中兴路，也即后来的宁夏府路。

A1，B2，manglay：蒙古语 manglai “先锋，头哨，前卫”的借用语。汉文资料音译作“莽来”①。

A2，B2，taykim baγatur：Taykim 为人名，baγatur 为含有“英雄、勇士”之意的人名或称号。

A2，mančuširi bodistv：“文殊菩萨”。指写有该题记的莫高窟第 61 窟本尊文殊菩萨像。

A4，qour：蒙古语 qour ~ qoor “毒、危害、恶毒”的借用语②。qour köngül 意为“毒心”，相当于梵语的“毒心、恶心、恶鬼(duṣṭa ~ duṣṭa-citta)”。“有毒心的(qour köngül-lüg)”，应是对自身的佛教信仰不成熟的一种谦虚表现。

A5，qočo-luγ mungsuz šabi：“高昌的孟速思·沙弥”。回鹘人名 mungsuz 在汉文史料中音译作“孟速思”。蒙元时期的同名人物，有世祖即位时作出贡献的别失八里(Biš-Balïq)出身的回鹘人孟速思，但本题记的孟速思当为别人③。

B2，tümän (bä) gi：意为“万户长，万人之长”，亦存在于蒙元时代的回鹘语文献中。另借用蒙古语 tümen noyan“万户长”的 tümän noyïn 这一形式，亦存在于回鹘语中④。蒙元时期中兴路、宁夏路曾存在“万户”，“万户府”，这可在蒙元时代编纂史料中得到确认⑤。

森安孝夫将该题记中的“高昌的孟速思·沙弥”，视作反映蒙元时期吐鲁番、敦煌二地间人员交流的证据⑥。但依据上举题记整体内容而言，即便孟速思·沙弥的出生地为高昌(Qočo)，但他是随行万户长，从宁夏路直接出征到西方敦煌的可能性很大。

---

① TMEN I, Nr. 369.《元史》中数次出现“莽来”之用例。党宝海先生视其为漠北蒙古高原之地名(党宝海《元朝延祐年间北方边将脱忽赤叛乱考》《西域研究》2007—2，p. 63)。但党先生提到的用例，亦可用蒙古语原意“先锋、前卫”来解释。

② Lessing, p. 973;《蒙汉词典》p. 641。

③ 程钜夫《程雪楼文集》卷六，《武都智敏王述德之碑》;《元史》卷一二四，孟速思传;Franke 1978; 森安孝夫 1988, pp. 440 - 441。

④ 松井太 2003, pp. 58 - 59.

⑤ 《元史》卷三〇，泰定帝本纪，泰定三年(1326)十月条“宁夏路万户府，庆远安抚司饥，并赈之”;《元史》卷三九，《顺帝本纪二》，至元三年(1337)正月癸丑条“立宣镇侍卫屯田万户府于宁夏”。

⑥ 森安孝夫 1988, p. 441。

五、来自吐鲁番的回鹘游人题记

上举莫高窟第61窟题记题记之作者“高昌的孟速思·沙弥”,是从宁夏访问敦煌的人物。与此相对,作为从吐鲁番地区访问莫高窟、榆林窟的游人的题记题记,可举出如下两条。二者均以草书体回鹘文写成,确切无疑属于蒙元时代。

① 榆林窟第33窟,主室北壁,劫魔变相图中央短册部分

1 qočo balïq-lïγ-ï darm-a (- - - - - - - - - -) bu ïduq

2 aranyadan-qa yuküngäli kälip yukünüp yanar-ta

3 bitiyü tägintim kinki körgü ödig bolzun tip

“高昌城民答儿麻(Darm-a)……来拜这神圣的阿兰若,拜完回去时谨书。愿日后成为纪念”

【词注】

1. qočo balïq-lïγ-ï:“高昌城民”。回鹘语 balïq-lïγ 意为“属于城市(balïq)的”,即为“城民”。

2. darm-a:来自梵语 dharma 的人名。之后的部分,文字模糊,未能判读。大概记有与答儿麻(Darm-a)同行的榆林窟巡礼者之名。

3. aranyadan:“阿兰若;寂静处,远离处”。据德国茅埃(Dieter Maue)博士示教,梵语 araṇyāyatana- 经由吐火罗语 araṇyāyataṃ ~ araṇyataṃ 借入回鹘语中。

写有该题记的短册部分共存4行字空间,但实际上只写有3行,末尾留有1行字空白。

② 榆林窟第12窟,游人题记 H(本文第3节刊出)西侧

1 quluḍï turpan-lïγ šinšiṭu (.)

“仆,吐鲁番的禅师奴……”

上述题记②以装饰字体写成。人名 šinšiṭu 来自汉语“禅师奴”。后续文字只写有第1字就中断。

蒙元时代的莫高窟、榆林窟的回鹘语、蒙古语题记题记中，作为巡礼者的出生地，提到沙州（Saču）、瓜州（Qaču）、肃州（Sügčü）、永昌（Yungčang）、哈密（Qamïl）、纳职（Napčik）等地[①]。在此基础上，依据上举题记①②可明断，高昌（Qočo）、吐鲁番（Turpan）等吐鲁番盆地内城市亦包含于敦煌诸石窟的巡礼圈内。

以往，笔者根据对敦煌北区出土蒙古语 B163：42 文书的分析，阐明 14 世纪后半叶，在元朝统治下的敦煌与察合台汗国治下的高昌、吐鲁番之间，回鹘佛教徒频繁进行巡礼活动[②]。上举题记题记①②，亦力证连接新疆与河西的回鹘佛教徒的移动与交流状况。

结　语

本文利用的回鹘语题记题记，是莫高窟、榆林窟所留数百条题记题记中的一小部分而已。笔者希望经过今后整体详细地调查，本文中的见解能得到进一步的补充与扩展。

参考文献

村上 正二（Murakami Masatsugu）1951：《元朝秘史に現はれた“奄出”（ömčü）の意味について》，《和田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讲谈社，pp. 703—716.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师范大学蒙文系 1990：《敦煌石窟回鹘蒙古文题记考察报告》，《敦煌研究》1990－4，pp. 1－19，＋5 pls.

哈密顿（Hamilton，James）、杨富学、牛汝极 1998：《榆林窟回鹘文题记译释》，《敦煌研究》1998－2，pp. 39－54.

哈斯额尔敦（Qaserdeni）、嘎日迪（Garudi）、巴音巴特尔（Bayanbaγatur）1989：《莫高窟第 61 窟甬道南壁回鹘蒙文题记释读》，《敦煌研究》1989－1，pp. 30－34，15，＋1 pl.

刘迎胜、卡哈尔·巴拉提（Kahar Barat）1984：《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回鹘文碑文之校勘与研究》，《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8，pp. 57－106.

梅村 坦（Umemura Hiroshi）、松井 太（Matsui Dai）2008：《ウイグル文字テュルク语文书》，吉田顺一/齐木德道尔吉（Čimeddorji）（编）《ハラホト出土モンゴル文书の研究》，东京，雄山阁，pp. 191－194.

① Matsui 2008，pp. 27－28.

② 松井太 2008。

《蒙汉词典》,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

牛汝极 2002:《敦煌榆林千佛洞第 12 窟回鹘文题记》,《新疆大学学报》2002 - 1, pp. 120 - 129.

萨仁高娃(Sarangowa)2006:《伯希和洞窟笔记所见少数民族文字题记》,敦煌研究院(编)《2004 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pp. 774 - 791.

森安 孝夫(Moriyasu Takao)1988:《敦煌出土元代ウイグル文书中のキンサイ緞子》,《榎博士颂寿记念东洋史论丛》,东京,汲古书院, pp. 417 - 441.

森安 孝夫(Moriyasu Takao)1991:《ウイグル = 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紀要》31/32.

森安 孝夫(Moriyasu Takao)2000:《沙州ウイグル集团と西ウイグル王国》,《内陆アジア史研究》15, pp. 21 - 35.

森安 孝夫(Moriyasu Takao)2011a:《シルクロード东部出土古ウイグル手纸文书の书式(前编)》,《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51, pp. 1 - 31.

森安 孝夫(Moriyasu Takao)2011b:《シルクロード东部出土古ウイグル手纸文书の书式(后编)》,森安孝夫(编)《ソグドからウイグルへ》,东京,汲古书院,pp. 335 - 425.

森安 孝夫(Moriyasu Takao)2011c:《2006 年度内モンゴル 宁夏 陕西 甘肃调查行动记录》,森安孝夫(编)《ソグドからウイグルへ》,东京,汲古书院,pp. 474 - 531.

松井 太(Matsui Dai)2003:《ヤリン文书:14 世纪初头のウイグル文供出命令文书 6 件》,弘前大学人文学部《人文社会论丛》人文科学篇 10, pp. 51 - 72.

松井 太(Matsui Dai)2008:《东西チャガタイ系诸王家とウイグル人チベット佛教徒》,《内陆アジア史研究》23, pp. 25 - 48. 中译:松井太著,贺小萍译《东西察合台系诸王家与回鹘人藏传佛教徒》,彭金章(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研究》下册,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 pp. 547 - 564;松井太著,杨富学、刘宏梅译《东西察合台系诸王族与回鹘藏传佛教徒》,《甘肃民族研究》2011 - 3, pp. 46 - 63.

谢静、谢生保 2007:《敦煌石窟中回鹘、西夏供养人服饰辨析》,《敦煌研究》2007 - 4, pp. 80 - 85.

杨富学 2011:《榆林窟回鹘文威武西宁王题记研究》,《朔方论丛》1, pp. 96 - 103.

杨富学、张海娟 2011:《元明蒙古豳王家族史研究回顾》,《吐鲁番学研究》2011 - 2, pp. 131 - 141.

杨富学、张海娟 2012:《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西北边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 - 2, pp. 21 - 37.

张海娟、杨富学 2011:《蒙古豳王家族与河西西域佛教》,《敦煌学辑刊》2011 - 4, pp. 84 - 97.

Battacharya-Haesner, Chhaya 2003: *Central Asian Temple Banners in the Turfan Collection of the 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 Berlin*. Berlin.

BSA = Albert von Le Coq, *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Ergebnisse der Kgl. Preussischen Turfan-Expeditionen*, I-V, Berlin, 1922 - 1926 (Repr. Graz 1973 - 1974).

ED = Gerard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 Century Turkish*. Oxford.

Franke, Herbert 1978: A Sino-Uighur Family Portrait. *The Canada-Mongolia Review* 4, pp. 33 – 40.

Geng Shimin 耿世民 / James Hamilton 1981: L'inscription ouïgoure de la stèle commemorative des Iduq qut de Qočo. *Turcica* 13, pp. 10 – 54.

Hamilton, James / Niu Ruji 牛汝极 1998: Inscriptions ouïgoures des grottes bouddhiques de Yulin. *Journal Asiatique* 286, pp. 127 – 210.

Kara György 1976: Petites inscriptions ouigoures de Touen-houang. In: Gy. Kaldy-Nagy (ed.), *Hungaro-Turcica*, Budapest, pp. 55 – 59.

Lessing, Ferdinand 1960: *Mongolian-English Dictionary*. Berkeley / Los Angeles.

Matsui Dai 2008: Revising the Uigur Inscriptions of the Yulin Caves. *Studies on the Inner Asian Languages* 23, pp. 17 – 32. 中译: 松井太著,张铁山、李刚译《榆林石窟回鹘文题记重考》,《民族古籍研究》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pp. 34 – 44.

Matsui Dai 2012: A Sogdian-Uigur Bilingual Fragment from the Arat Collection. 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编)《语言背后的历史: 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pp. 115 – 127.

Moriyasu Takao 2000: The Sha-chou Uighurs and the West Uighur Kingdom. *Acta Asiatica* 78, pp. 28 – 48. 中译: 森安孝夫著,梁晓鹏译《沙州回鹘与西回鹘国》,《敦煌学辑刊》2000 – 2, pp. 136 – 146.

Moriyasu Takao 2001: Uighur Buddhist Stake Inscriptions from Turfan. In: L. Bazin / P. Zieme (eds.), *De Dunhuang à Istanbul: Hommage à James Russell Hamilton*, Turnhout (Belgium), pp. 149 – 223.

MOTH = James Hamilton, *Manuscrits ouïgour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Paris.

Russell-Smith, Lilla 2005: *Uygur Patronage in Dunhuang*. Leiden / Boston.

TMEN = Gerhard 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I-IV. Wiesbaden, 1963 – 1975.

Zieme, Peter 1978: Materialien zum uigruischen Onomasticon I. *Türk Dili Araştırmalar Yıllığı Belletin* 1977 [1978], pp. 71 – 84.

【附记】本论文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第22520707号;第26300023号;第26580131号),以及三菱财团人文科学研究助成(2011年24号)之研究成果的一部分。莫高窟敦煌研究院为敦煌地区诸石窟多种语言题记的考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与援助,在此深表感谢。另题记的现场调查,得到了白玉冬(内蒙古大学)、坂尻彰宏(大阪大学)、荒川慎太郎(东京外国语大学)、佐藤贵保(盛冈大学)、岩尾一史(神戸市外国语大学)、赤木崇敏(四国学院大学)六位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Old Uigur inscriptions of the Mogao and Yulin caves

Dai Matsui

Abstract: By courtesy of the Dunhuang Academy, I have been engaged with the investigations on the Old Uigur inscriptions of the Mogao Caves and Yulin Caves. For those Uigur inscriptions we can set two categories: one is those for the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attached to the portraits of donors. Most of donors belong to the higher society, and they should be the key figures in Dunhuang history. The other category is memorial writings by the pilgrims who visited the caves. Mostly they had nothing to do directly with the Buddhist wall paintings nor with portraits of the donors, however they comprises various information, e. g., the pilgrims' names, homelands, purpose of their pilgrimages and their religious wishes. Such information can be important in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practical aspects of Uigur Buddhists around Dunhuang area.

In this paper I would present the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results of my investigations, especially historical information extracted from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donors of Yulin Cave 39 and Mogao Cave 332, as well as from the memorial writings in Yulin Cave 12, Mogao Cave 61, etc.

作者工作单位：日本大阪大学

译者工作单位：内蒙古大学

西域—中亚语文学研究

2012年中央民族大学主办西域—中亚语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　主编



Studies in Central Asian Philology

Pap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entral Asian Philology, November 2012, Beijing

Edited by Abdurishid Yakup

上海古籍出版社